







纪念版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吴雷川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吴雷川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

ISBN 978-7-100-15225-9

I. ①基… II. ①吴… III. ①基督教—关系—传统  
文化—中国 IV. ①B978②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9032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吴雷川 著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225-9

---

2017年12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½

定价:95.00元



吴雷川

(1870—1944)



#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 (120 周年纪念版)

### 出版说明

商务印书馆自 1897 年始创,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宗旨,于建馆翌年便出版了《马氏文通》,这部学术经典既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也开启了商务印书馆百年学术出版的序幕。

其后,商务印书馆一直与中华现代学术相伴而行,出版了大批具有鲜明原创精神并富于学术建树的经典著作,诸多开山之著、奠基之作都是在本馆首次问世。这些学术经典的出版,使本馆得以引领现代学术发展,激动社会思想潮流,参与民族新文化的构筑,也分享中国学界的历史荣光。

1949 年以后,本馆虽以译译世界学术名著、编纂中外辞书为侧重,但原创学术著作的出版从未止步。2009 年起,我馆陆续出版“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全面整理中华现代学术成果,深入探寻现代中国的百年学脉。

丛书收录上自晚清下至 1980 年代末中国原创学术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

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地理学、心理学、科学史等众多学科。意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收录各学科学派的名家名作,展现传统文化的新变,追溯现代文化的根基。丛书立足于精选、精编、精校,冀望无论多少年,皆能傲立于书架,更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共相辉映,昭示中华学术与世界学术于思想性和独创性上皆可等量齐观,为中国乃至东方学术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应有的地位。

201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迎来了120岁的生日。为纪念本馆与中华现代学术风雨同行的这段历程,我们整体推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200种),既有益于文化积累,也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诸位学界通人致以感激和敬意。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两个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传承前辈的出版精神,迎接时代的新使命,且行且思,我们责无旁贷。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年11月

# 凡 例

一、“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晚清以迄20世纪80年代末,为中华学人所著,成就斐然、泽被学林之学术著作。入选著作以名著为主,酌量选录名篇合集。

二、入选著作内容、编次一仍其旧,唯各书卷首冠以作者照片、手迹等。卷末附作者学术年表和题解文章,诚邀专家学者撰写而成,意在介绍作者学术成就,著作成书背景、学术价值及版本流变等情况。

三、入选著作率以原刊或作者修订、校阅本为底本,参校他本,正其讹误。前人引书,时有省略更改,倘不失原意,则不以原书文字改动引文;如确需校改,则出脚注说明版本依据,以“编者注”或“校者注”形式说明。

四、作者自有其文字风格,各时代均有其语言习惯,故不按现行用法、写法及表现手法改动原文;原书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亦不作改动。如确系作者笔误、排印舛误、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径改。

五、原书为直(横)排繁体者,除个别特殊情况,均改作横排简体。其中原书无标点或仅有简单断句者,一律改为新式标



点,专名号从略。

六、除特殊情况外,原书篇后注移作脚注,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夹注。文献著录则从其原貌,稍加统一。

七、原书因年代久远而字迹模糊或纸页残缺者,据所缺字数用“□”表示;字数难以确定者,则用“(下缺)”表示。



# 目 录

吴序	1
自序	8
第一章 引论	11
第二章 耶稣事略	24
第三章 耶稣训言纲要	41
第四章 耶稣为基督	63
第五章 基督教在世界历史上的价值	75
第六章 基督教与中国的关系	93
第七章 中国文化以往的检讨(上)(学术思想之部)	113
第八章 中国文化以往的检讨(下)(政治社会之部)	154
第九章 中国文化未来的展望	176
第十章 基督教更新与中国民族复兴	202
吴雷川先生学术年表	赵晓阳 222
吴雷川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卓新平 228



## 吴 序

吴雷川先生撰著《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书既竟，嘱我为它写一篇序文，我以自己学识简陋，对于基督教和中国文化都没有深刻的研究，本不敢答应，但后来将此书细细读过一遍，觉得它思想新颖，持论公允，而又能处处针对中国现在的需要，发人深省，因此引起我自己不少的感想，觉得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又因为著者是我多年的朋友，并且在年龄、学问和经验上都是我所敬畏的一位前辈，不但情不可却，并且为这一本有意义的著作，结这一段文字之缘，于我是一件荣幸的事，也是一件快乐的事；因此便不揣冒昧，写了这篇文字，以就教于著者。

这本书把基督教和中国文化，分作两部分来分别叙述。对于基督教，它认为就耶稣的教义而言，它是一个革命的宗教——谋求社会改造的宗教。它征引了福音书中许多关于耶稣的言行，大胆地否认传统的说法，以为耶稣的宗教不是一般所谓精神的、个人的宗教，而是充分地表现着政治革命和经济改造的意义的宗教。对于中国文化，在学术思想之部，它征引了几位学者的意见，以说明中国文化的本质；在政治社会之部，它是取批评的态度，把中国文化过去许多的弱点指出来。它不承认中国有“复古”的可能，也不承认可以用旧瓶装新瓶的方法，把旧文化的某些部分，机械地应用于今日的中国。在另一方面，它却不否认中国文化在过去的贡献



和对今日的意义。它正确地取一种演进的看法,从国际大势和中国的需要,肯定中国社会的必须变革。从这两部分的叙述,它便归结到基督教之必须洗刷其过去的错误,发扬其所固有的社会改造的精神;中国文化之必须演进而成为一种可以创造新社会的文化,并说明基督教在这演进中所特有的功用,尤其是造成领袖人才的功用。

这一本书可以说是从一个新的社会认识的观点写的。在一般人看来,这一个观点也许并不怎样新奇,因为在近十年来,中国的思想界确是突飞猛进。社会改造的意识,虽然还没有普遍于社会的各阶层,可是在前进的知识分子,以至在觉悟的劳苦大众,它差不多变成了天经地义,尤其是在“九一八”以后,国际形势的激荡,国难事实的启示,使人感觉: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已经发达的国家,或是在生产落后的半殖民地,也不管时间有迟早之不同,方法有刚柔的分别,将要成为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实。由于这种意识的传播,一般人对于政治问题,对于经济问题,对于一般的社会问题,以至对于整个中国文化,都取得了一种新的眼光,用它去衡量一切,批判一切。也是由于这种意识的传播,非宗教的分子对于宗教,一部分是取极度批评的态度,一部分是取相对容忍的态度。批评的是觉得宗教在未来的社会里没有地位,容忍的是觉得宗教还有它一部分的真理。但无论如何,因为他们所见到的宗教只是一种维持现状的势力,所以对它是没有什么热烈的希冀的。

对于一般信仰基督教的人,这本书所提供的一些意见,可就取得不同的意义了。时势的演变,把中国的,以至世界的思想界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但同样时势的演变,却还没有把中国的,以至世



界的基督教思想界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基督教的思想界,在这大变动的时期中,表示了三种不同的趋向:第一种是出世的趋向,第二种是改良的趋向,第三种是妥协的趋向。出世的趋向是表示于种种的神秘主义和奋兴运动。这一派思想,当然有精粗深浅的不同,但是它们之认为宗教对现世生活应当取一种超然的态度,甚至是两不相干的态度,却是一致的。第二种趋向是表现于基督教里面种种的改良运动。它所注意的是个人生活的改善和现社会若干不良现象的废除。这一种因不满于现状而产生的努力是极可嘉许的,也是与基督教的精神完全一致的,然而因为它忽略了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联系性,也没有了解社会制度对社会现象的关系,所以它对目前社会的危机是没有认识,也是无法应付的。第三种是妥协的趋向。这种趋向,并不始于现在,但现在的政治形势却更清楚地把它呈露出来。自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变成了国教,它便几乎做了政治的附庸;自从西方资产阶级兴起,它实际上又做了现制度的撑持者。大战以后,若干国家建立了法西斯政权,所谓“极权的国家”(Totalitarian state)代替了名义仅存的民主政治,于是万有统于一尊,宗教不但失去指示现世生活的能力而同化于现状,即连其本身信仰的自由,亦几不复存在。这种现象,在今日的德国,尤其显著。若干先觉的分子,有见于此种危险,于是有“教会抵抗世界”(The church against the world)的呼声。以上三种趋向既日益普遍,于是耶稣入世革命的教义益晦,而基督教在这变乱的世代,遂益成为一种无足重轻的力量。

本书所揭櫫的基督教改造社会的主张,到了最近,才在以上各种分歧的思想中,独露头角,成为一种新兴的势力。在二十几年前,在美国便有所谓“社会福音”的提倡,但因为在那时,现社会制



度的弱点还没有充分地暴露出来,所以这一派的思想,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了最近几年,恶劣的社会现象,逼着人不得不思想宗教对社会所应采取的态度,于是耶稣社会改造的福音,重被发见,而基督教革命的呼声,始为一般人所注意。我认为这一派思想在今日的中国实在有提倡的必要,所以本书的出版,更可以说是有着时代的意义。与这一种思想同时发展的就是基督教神学思想一般的转变。以前的所谓近代主义运动(Modernist movement)更演变成为一种以科学和经验为基础的新神学运动。它企图把宗教思想变成合理化与近代化。这一派思想当然更适合于现代知识分子的口胃。至于它的是非得失,我们就不能在这里讨论。但由于这种运动,若干因现代思想的侵袭,在信仰上彷徨的人,便恢复了、稳定了他们的信仰,而若干还在宗教门外的人,也因此便对宗教发生了追求的兴趣。在物观的反对宗教者看来,这些“进步的”宗教,比之守旧的宗教,其危险性更大,但我们当然是不同意于这种意见的。

说到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本书著者的态度,也是值得我们嘉许的。他既不拘泥于中国过去文化之特质,主张基督教与它“调和”,也不像一般肤浅的批评者,认为基督教和中国的文化,都是时代的渣滓,应当完全放弃。他所主张的却是“基督的更新与中国民族的复兴”,而认为前者对后者必然有它的贡献。我们赞成这种主张,我们应当为这种主张努力,使基督教在未来的中国,不致再蹈它在西方的覆辙。我们更相信:从中国文化所遗留下来的,处处顾到现实生活(唯实主义)和不大喜欢神秘和玄谈(自然主义)的倾向,将使我们对于现代基督教的社会化运动和科学化运动,更能作有力的贡献,以发扬基督教所固有的精神。

末了,对于本书论及基督教之处,我愿意提出两点意见,和著



者讨论。

第一是关于耶稣工作计划的解释。本书认为耶稣最初的计划包含两点：一是他确要取得政权而作复兴犹太的基督；二是他预备取得政权后就行改造社会的主义。又说耶稣对于计划的第一点，后来确是转变了，至于第二点，则始终没有转变。关于这两点，虽然著者举了福音书上若干的事实来证明（参看《耶稣为基督》一章），我觉得在解释方面，还是有商量的余地。我个人的意见大体是这样的：

（一）耶稣对于整个工作计划，在“旷野试探”时，经过深刻的考虑与祈祷，大体上已经决定，至少在短短的工作时期中，在原则上不致有所改变。

（二）耶稣深知社会改造不是旦夕间可以实现的事，因为社会改造至少必须先经过一番宣传启导的工作，使大众有所觉悟。因此，耶稣的计划，与其说是企图马上实行社会改造，毋宁说是做了社会改造在知识和灵性上所必需的准备工作。

（三）改造社会自然要取得政权，但人民没有准备而取得政权，时机没有成熟而取得政权，那是不彻底的，是耶稣所决不肯为的，因此，与其说这是耶稣后来的转变，毋宁说这是他的预定的方针。

（四）由于以上的解释，耶稣对“基督”这称呼的见解，（甲）不是一般人所希冀的纯民族主义的，狭义的复兴犹太的基督，（乙）也不是急功近利的以现在我们现在的所谓“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基督，而是（丙）以整个的人生的改造为目标的基督。这目标自然包含了我们现在所了解的“社会改造”，然而比它更广大，更深厚。我相信这一个意义从始就在耶稣的心里，然而因为它过于高深，一般人固然不能接受，就是门徒们始终也没有了解，甚至在耶稣死后。



第二,是与第一点有密切关系的,关于基督教的理想,和从这理想出发的对于国家、政治、战争诸问题的态度。本书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是:

基督教固然以全人类得救为博爱底目的,但社会进化有一定的程序,不能躐等而几。

基督教有所谓“无抵抗主义”,每为指摘基督教的人所藉口。其实这种无抵抗主义,只是个人与个人间在某种情况之下所应用的事理,本不是为国家民族说法的。

基督教唯一的目的是改造社会,而改造社会也就是寻常所谓革命。纵览古今中外的历史,凡是革命事业,总没有不强制执行而能以和平的手段告成的……所以有人高举唯爱主义,说基督教不可凭藉武力以从事革命,这种和平的企望,我们在理论上固然应当赞同,但从事实着想:如果要改造社会,就必须取得政权,而取得政权又必须凭藉武力,倘使基督教坚持要避免革命流血的惨剧,岂不是使改造社会底目的成为虚构以终古?

以上所引的话,一部分我可以完全同意,但另一部分我觉得还有讨论的余地。因此,我便把我个人对这问题的意见,简略地叙述于下。

我与本书的作者完全同意的,有以下的几点:

(一)基督教并没有叫人不爱国;受真理指导的国家建设和民族解放正是全人类得救一个必经的阶段。

(二)基督教应当参加政治活动,因为宗教生活是包括人生的



各方面的。

(三)基督教的目的是人与人的合一(爱)和人与上帝(真理)的合一——这当然包括社会改造。

我觉得还可以考虑的有以下的一点：

(四)关于革命的手段,我认为应当把耶稣自己的主张和今日基督教可能采取的方法,分别而论。耶稣自己的主张,我认为是绝对唯爱的、非武力的,然而它却不是纵容放任的无抵抗。但今日的基督教和一般基督徒——更不必论其他的人——却还没有达到追踪基督,实行他的最高理想的程度。因此,就事实论,“强制执行”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只能说是基督教的妥协,而不能说是基督教最高的理想。耶稣的教训是一致的,他没有把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分开——事实上这也不可能。美人 Reinhold Niebuhr 氏在他的《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青年协会出版)曾指出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因为性质不同,不能应用同样的方法,但在他的《释基督教伦理》(*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里,他却承认耶稣唯爱的教训的绝对性,并说:由于人类天然的缺欠(罪),人类对这绝对的理想,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登峰造极,因此他便承认非唯爱的武力在现社会生活的必要性。我认为这种说法,比较近于真理。

以上两点,关系颇大,但因限于篇幅,不能在这里作详细的讨论,只能把我个人不同的意见指出来,以请教于著者,并供读者的参考。

吴耀宗

1936年8月26日



# 自序

在前年六月间,我的朋友吴耀宗先生给我来信说:“青年协会的三年出版计划中,有一本书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要请你撰著。字数请你酌定,最好多不过十万字,少不减于六万。请于一年内写成,明年五月底以前交稿。”当时我因为:(一)基督教末次来到中国,已经一百余年,中国知识界中人信仰基督教的也不少,却还没有人以本国文化为立场参合时代思潮来论述基督教,写成一册比较具体的文字,我早已引为憾事;(二)按照所限制的字数,这本书的内容,似乎难于繁征博引,有详细的叙记,我或者可以藉口于此,掩饰我所写的内容疏略。于是我就不度德量力,贸然地回信应允了。

我既应允了写这本书,在前年暑假期中,曾略加思索,想要拟定大纲,才觉得这本书标题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当然是要说明二者的关系,既要说明二者的关系,就必得对于它们的本身有充分的认识。但是,以具有四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传播世界已经一千多年的基督教,它们的本身都是高明、博厚,而且悠久。要说是认识了它们,能分别提纲挈领地陈述出来,更说明其所有的关系,真是不易着笔,因而就暂时搁置。学校开学后,我忙于授课,又时有人事纷扰,经过半年,还未写得一字。到了上年春季,我又在学校多任一门功课,更少有闲暇来写书,只得向青年协会请求将原